



我在北醫

甲 凱

民國四十九年八月我應聘到台北醫學院任教。當時學校剛剛創立，除了一片相當廣袤的建校基地以外，其他設備尚欠完善。不過我對創辦學校的幾位董事却是心儀已久。胡水旺先生，徐千田先生，郭宗換先生，章榮熙先生都是學術湛深，聲聞遐邇的醫學博士，朋友們談起來無不欽佩。及至見面相處以後，知道胡先生任董事長；徐先生任院長；郭先生任教務主任；章先生任總務主任今已易人，他們那種謙和的君子之風，及待人接物的誠樸嚴謹，感人至深，因而使我對北醫建校成功的信念非常堅定。目前北醫各種設備蒸蒸日上，已具規模。回憶當時的想法，可說得到確實的印證了。

我在到校之初，除授大一國文外，尚受聘兼訓導方面的兩項職務：一是課外活動組主任；一為生活管理組主任。訓導工作我並不是內行，但個人一向認為師友之間應有的關係是「陶冶切磋」，不應有的態度是「管制支配」，所以對上面兩種職務倒也覺得無所謂，就毅然的答應下來。到了開學前不久，軍訓主任教官一陳東佛上校一到任，由他接手生活管理組主任的職務，我們合作無間，頗為愉快。

北醫的國文教授，開始時共有三人：即萬子霖先生，李劍南先生，再加我的濫竽充數，很平均的分担了大一的國文課程。萬先生為國學名宿，昔在文風極盛的蜀中，已為翹楚，到北醫授此種課程，自是遊刃有餘。李先生則為國語文專家，也是號召力甚大。只有我個人以歷史系出身而授文學，不免有點惶惶難安的感覺。幸虧我們集會商討的結果，選定「史記」與「左傳」為讀本，而這兩書都與史學為不可分，是我早年就研讀過的。其後在大學求學時又從陳援庵、余嘉錫二先生受業，略有心得，所以登堂授課，尚能不辱所命。至於同學曾否受到裨益則未敢必，自信不生舛誤，也就差堪告慰了。

北醫學生的程度一向很整齊，實力不弱。在國文方面來說，不論上課或自修，都有相當的成績。

上課時除了研究「史記」的集解、索隱、正義之外，尚有時間談談清代汪越、王元啟、孫星衍、萬斯同、梁玉繩諸家的著作。我們雖然沒有時間多事考據，但同學間也能注意到古書的正譌，以及年月和地理的質疑。有時同學們會在研讀過的課文中注錯幾個字音，如「軍無見糧」之「見」，仍注作「一今」（應讀現）；「漆身爲厲」的「厲」，仍注作為「一」（應讀賴）之類，可說是偶然的錯誤，大醇而小疵，而且是少數中之少數了。

北醫的國文課，上學期授「史記」；下學期則以「左傳」為讀本，二者皆係節錄的本子。史記仍能自成篇章，左傳則不免有支離破碎之感，所以一般學生於史記很感興趣，對左傳則不免有些「憂憂乎其難哉」的現象。第一學年的下學期我曾嘗試以宋呂東萊的博義配合左傳來講，想借以提高大家評斷事物和史論的能力，但是真能（引申）「釣者負於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於獸，獸何負於獵」一類議論者，並不太多，自然更不容易求得可以批判「鄭莊公克段於鄢」之用心和是非的學生了。

始到北醫的一年中，我中斷了在報紙上寫雜文的習慣。這多少是受了陳白沙「莫笑老儒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的影響。但更大的原因是我決心要寫一部較長的論文。亦即到今天始能完成初稿的「宋明理學發展史」。（字數超過十七萬字。）關於宋明理學，今日關心者已不多。即有關心者，也多半停留在舊觀點上，很少以歷史演進的立場去研判這種學問。事實上，任何一種學術皆有其根源，也有其演變。不宜被一家一派，一時代，一地方的見解所拘限。治理學者皆知尊重黃梨洲。黃氏固然偉大，後世學者却不應以僅讀「宋儒學案」或「明儒學案」為滿足。這道理很簡單，呂氏春秋察今篇有一則故事說：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我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

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刻舟求劍」正是一般人自囿於成見的毛病。理學三百多年來已漸為學者所屏棄，偶有言者也只是固守舊說，無所發明。其實宋明理學中有許多值得重新估價的人和事。譬如明代理學家中有個李卓吾，他一向被正統派的理學家目為「不醇」；另一方面由於他主張「三教（儒道釋）歸一」的理論，也被漢學家視為迂闊而不屑一顧，但他有些見解的確是很高明的。如其「焚書」卷二「答以女人學道為短見書」云：

「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

這種男女平等的說法，見之於中國十六世紀的中英，不能不說是開風氣之先者。再看他「藏書」卷二十九「司馬相如傳後」說：

「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忍小耻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

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皇，安可誣也。」

這種打破中國向來婚姻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議論，不但透澈而且富革命性，即在今日仍覺其新穎可愛，此種論調能出之於一個明代理學家之口，不是很有意思的事嗎？我有感於宋明理學有很多未被後人了解，或被後人誤解的地方，所以先寫「宋代理學史」一稿，繼而又寫「明代理學發展史」。這兩部稿子應是我在北醫四年中較具體的成績。成敗得失，固所非計，至少在自己的心裡可以覺得不虛度數年的時光了！

台北醫學院在民國五十一年三月正式成立圖書館，開館之初，徐院長指定由我負責，這無疑的是個相當艱鉅的使命。限於環境，暫時我們不會有一座理想合用的建築物，只能暫借用化學實驗室的二樓供為閱覽室和藏書室。至於書籍更是要從無生有，由頭理起。管理圖書我在過去雖有點經驗，略具常識。但對醫學書籍却是門外漢。單是一些「分類」「編目」問題，便够傷腦筋的了。當時我買了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Medical Library Practice，以及 Huffausan 的 Manual for Medical Record Librarians 詳細參閱，才解決了一些技術上的問題。但是更重要的事是如何使書庫

的庋藏日漸充實。我們向國內外的文化機構呼籲贈書也參加了 The United States Book Exchange Inc.。這些措施並不能使我們的圖書立刻有特別顯著的增加。至於購買書籍，我們雖不吝付出專款，也會向家長募捐，然而有數的款額，用以購買「寸紙寸金」的醫科書籍，真形同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一部 Primate Comparative Anatomy and Taxonomy 訂價高達八千元。一年期的 Chemical Abstract 需要美金五百塊。在此情形下，欲使圖書館迅速獲得充實，具備規模，實匪易舉。不過堪以告慰的是我們在萬般困難中仍然買了一些極有價值的醫科書，而這些書很多是麻煩院長徐千田博士親身鑑定過的。目前我們圖書館的藏書雖然不多，至少尚有兩點，值得驕傲：

一、凡屬醫藥方面的書，百分之九十九為原版，即使買一冊書需花費數百元，乃至千元以上，在所不惜！這在一般圖書館是不易做到的。

二、一九六二年以前的書，不能說沒有，但絕大多數的書籍為一九六三以後的新版，這在研究醫學上來說，也十分重要。

圖書館方面值得改進的事情當然很多，但是「羅馬不是一日造成的」，祇要我們堅毅的一步一步做去，相信不久的將來必有一座完美的圖書館，供給同學們甚至社會人士來利用。

四年的時光不短，一眨眼也已成焉過去。這幾年來對於周遭的一切，我有蘇東坡赤壁賦中同樣的感想。蘇氏面對瞬息萬變的人生和永遠不變的宇宙說：

「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台北醫學院在四年的发展中，處處顯露出新面目，變化不算不速！然而身處其境的人們——包括全體的教授和學生——恐怕仍然覺得它變的太慢，進步的太緩！可是我們要了解，成功的事業和完美的人生必須在永不圓滿中去完成，假如凡事我們抱持「為而不有」的信念，那麼過去四年的成績是值得我們快樂和慶賀的了。

六月一日四週年校慶以後，我們將送第一屆藥學系的畢業生走上社會。對於這幾十位四年來朝夕相處的同學，內心裡實有無限的祝福，也有無窮的懷念。北醫的建校是全體師生的心血結晶，相信在「誠樸」的校風中薰陶了一千四百多天的同學們，一定具備了人生成功的條件，去創造他們遠大的前程。